

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孙圣民¹ 刘晓鸥²

(1.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对历史计量学的研究范式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整体把握是必要的。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定义应是开放的,涵盖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定量分析方法等内容。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要开展合作,需要交流的平台和合作的机会。由于历史计量学在假设前提、分析工具和方法上具有“非人化”特征,所以双方在合作内容上应讲求理论观点兼容并包、相互补充。培养历史计量学的学术梯队,对推进国内历史计量学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历史计量学的精髓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历史计量学这个学科有助于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从而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关键词:历史计量学;研究范式;学科定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2)05-0035-05

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又称新经济史学,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1]。历史计量学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之间的结合,在国际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而言,历史计量学在国内学界的反响并不热烈。国内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经对这个学科有过一段时间的热情,随后便消退了。伴随着历史计量学创始人诺思和福格尔教授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界对历史计量学的热情开始高涨。许多经济学者运用历史计量学的理论成果分析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这股经济学界的热潮发端于历史计量学,但并未有多少经济学者真正将研究聚焦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史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如韩毅^[2]、王玉茹^[3]、刘建生^[4]、陈争平^[5]、刘巍^[6]、赵德馨^[7]、赵凌云^[8]、苏少之^[9]等,积极探索运用历史计量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问题。但这些开创性研究并未引发国内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其他学者的跟进,国内历史计量学的发展似乎遇到了某些困难。本文尝试分析当前历史计量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探讨相关解决办法。文章讨论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定义,并就史学界与经济学界进行合作的前提、基础和内容等阐释自己的观点。历史计量学的精髓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历史计量学这个

收稿日期:2012-04-3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基础研究项目“新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案例研究”(2011JC001);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历史计量学与中国本土化研究”(12RWZD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11YJA790132)

作者简介:孙圣民(1975—),男,山东鱼台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后;

刘晓鸥(1982—),女,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学科有助于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历史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文呼吁广大学人抓住当前历史计量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加强对历史计量学这个交叉学科的理论梳理和案例研究。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参与,以及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的通力合作,可以有效推动历史计量学在国内的发展。

一、加强学科间沟通,整体把握历史计量学这个交叉学科

制约国内历史计量学发展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因素不容忽视:学界对当前国际历史计量学发展态势的了解可能不够充分,整体把握历史计量学这个交叉学科存在一定的困难。交叉学科的特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而这种交叉又是全方位的。交叉学科往往在研究方法、话语规范、分析思路,存在着冲突和矛盾。这种矛盾、冲突源于不同学科所拥有的不同研究范式。如果我们仅从一个平面的视角观察交叉学科,其存在的许多问题看似不能调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也步履维艰。但如果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看待这些矛盾、冲突,我们的分析就可以拥有一种层次感和立体感,也易于发现不同学科在哲学观、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理论前提、假设、结论等方面的可调和之处。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在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中找到加速两者融合的通道或桥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式进行一个高层次的、整体的把握。这也正是拙著《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一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以往的研究还曾就历史计量学的前沿动态进行了介绍^[10],并对历史计量学的不同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11],最近的一个尝试是运用历史计量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案例研究^[12]。

历史计量学是一个年轻的交叉学科,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甚至学科定义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例如,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定义有多个版本。韩毅教授将历史计量学定义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畴内,即历史计量学是把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学科,它不应该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韩毅教授认为西方的历史计量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福格尔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诺思只能算是历史计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诺思后来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来分析西方经济发展史,创立了新经济史学或称制度经济史学,此时他就已经与历史计量学派分道扬镳了。所以,此后出现的新经济史学、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历史的制度分析等等,都应属于经济学理论,而不应列入历史计量学的范畴,最多只能算是经济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研究的结合^{[2][13]}。相对于韩毅教授的定义,本文认为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定义应该更加宽泛。历史计量学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可以将历史计量学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计量学。按此定义,历史计量学应该涵盖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定量分析方法三大内容,从而将韩毅教授所说的相关经济学理论以及应用研究等都纳入历史计量学的范畴。

其实上述两个学科定义各有利弊。如果按照较小范畴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用来描述历史计量学在史学界的发展是十分妥帖的。按照这个定义,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服务的工具。本文对历史计量学赋予一个开放的定义原因有如下四点。第一,定量分析方法即使是作为工具应用于具体的经济史问题分析,也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才能运用得恰如其分。方法和理论需要相互支撑的这一特点,在历史计量学的早期发展中已经有所体现。第二,在为历史研究提供服务时,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也不一定非要排出个谁先谁后。因为,有时经济理论和经济观点已经潜移默化在研究者思考历史问题的逻辑中,所以经济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应该可以纳入历史计量学的定义中。第三,当前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倚重于经济史,同时经济理论的快速发展也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新思维、新视角和新工具。历史计量学作为沟通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的桥梁,在引发两个学科互动的同时,也使自身保持了新鲜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历史计量学这个学科拥有一个开放

的定义,如同拓展了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之间桥梁的宽度,更宽的通道,可以引发历史和经济两个学科之间更多的呼应,也促进历史计量学更快发展。第四,从学术队伍建设来看,更宽泛的定义不仅可以引起史学界学者对历史计量学的关注,还可以吸引更多的经济学界学者关注经济史、运用经济史,从而壮大历史计量学的研究队伍,繁荣历史计量学的学术成果,推动历史计量学的发展。

二、呼吁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通力合作

历史计量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要求研究者具备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掌握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史学家,对对方的研究领域多多少少都抱有一种陌生感。这是影响国内历史计量学发展的第二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的通力合作。

(一)合作的前提是双方拥有一个交流平台,提供平等的合作机会

目前国际上已经拥有了专门的历史计量学协会、杂志和年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经济学界与史学界互动的机会太少。当务之急是为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必要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如创办协会和年会,开办杂志或专栏等。双方可以通过合作撰写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并参与国际历史计量学活动,来提升国内历史计量学的研究水平。

(二)合作的基础是拥有合格的合作对象,形成学术研究梯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计量学时,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在国内才刚刚起步。历史学家缺乏合格的合作对象,即掌握现代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者。进入21世纪后,国内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正逐步与国际接轨,人员条件已经具备,但双方缺乏必要的合作机会。从长远看,有计划地培养历史计量学的研究梯队,特别是培养能够同时掌握经济学和史学知识的“通识型”青年学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跨学科合作的问题。综合型大学往往同时设有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历史计量学学科发展规划。例如机构设置方面,可以设立国内首个历史计量学博士点和历史计量学研究机构;知识结构构建方面,可以通过开创性的课程设置,培养一批既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又具备史学功底的复合型人才。这一点已经为国外历史计量学的发展所证明。从2000年左右开始,美国和法国的一些知名高校已经着手实施培养复合型经济学者。法国一些高校开设经济史课程时,所列的参考文献包括最新的历史计量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发表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史杂志上。这些参考文献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最新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方法,重新梳理、审视史料。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史中检验、修正甚至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反过来又运用这些经济理论来重新理解和指导现实中的经济实践活动。当下国内同仁需要开展的其他工作包括组建学术梯队、搭建学术平台、确立中长期研究主题等等。

(三)合作内容上讲求理论观点兼容并包、相互补充

谈及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合作,有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就是历史计量学往往被史学家说成“非人化”、“没有人”的史学样态。一些史学家认为历史计量学中所运用的计量和模型化方法,抽象掉了人与人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来源之一,也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认为,历史计量学的这个“非人化”特征来源于经济学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经济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同质”的,具有相同的“经济人”特征。所有个体被简化为一个点,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以说大部分的经济理论都是以这个经济学假设为基础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所以经济学研究中往往不研究个体的人,而是研究一群自私自利、类同的人过去如何行动,将来如何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更重视共性,而历史研究则更注重研究对象的个性。

二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也具有“非人化”特征。计量经济学在分析具有个体特征的人时,只是将其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的特征专门抽出来进行计量分析,而与其他人不同的特征,往往在计量分析中作为异常点给忽略掉了。计量分析认为这些个体所具有的异常特征,无法用来分析和反映样本整体所具备的规律性。而这些个体的鲜明特征,在史学研究中往往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史学家通常从

这些活生生的个体所具有的生命特征和生活轨迹中,寻找和揭示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背景和原因,进而说明这种结果形成的必然与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学家尝试的是从鲜活的个体或个别事件的分析中,揭示人或事发展的必然,是以小见大,是个案分析;而经济学家往往是从群体中寻找集体行动的逻辑,通过分析具有“非人化”特征的许多样本个体,来寻找同样的人或事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是以大略小,是大样本分析。

三是经济分析中常用模型化方法,视参与者为同样的个体,只是将这些个体所面对的不同环境和背景,作为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来处理。这样,从人是“非人化”的逻辑起点出发,由于每个人面对的外部条件不同,可以推导出这些人将拥有不同的结果。在史学分析中史学家有时也使用这个分析方法,但史学家可以将这个分析追溯到主人公的心理、文化、精神和气质等层面。这些层面恰恰是当前经济学正在努力拓展的方向。从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动态来看,经济学也正在试图解决“非人化”的特征,寻找“经济人”的“异质性”因素。当下实验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动向反映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即试图寻找一个反映人内心活动的表达方式。所以,历史计量学要反映人心理的因素,可能有两个方向可以推进这种努力:一是历史计量学从人群这个整体角度,借鉴实验经济学、认知科学的相关成果,推进对人内心活动的研究;二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个体时,将历史计量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作为工具,为史学的个案研究服务。

三、抓住历史计量学发展的机遇,吸引学界关注和参与

经济学是当下的显学,与之相比,经济史研究考虑的多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需要研究者抵御现实利益的诱惑,进行长期的投入,戒除浮躁,耐住寂寞。历史计量学虽然运用经济学知识,但研究对象主要还是经济史,所以,历史计量学研究者无法通过服务现实经济而直接获益,这不符合经济学讲求投入产出效益的要义。这是当前国内历史计量学发展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抓住现实提供给历史计量学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一)解释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需要历史计量学

当前经济学界个别学者对历史计量学的运用有些片面,他们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时只是照搬西方理论,抛弃了历史计量学和经济史的精髓——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华民族复兴等观点。如果这些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就必须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与他国相比,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分别是什么?借用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要找到这个民族特色,需要我们回头认真审视民族的历史。真正反映中国经济特征的不仅仅是短短30余年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应回溯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要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对比研究中外经济发展史,对比研究过去和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这也是中国经济学要登上国际经济学殿堂必做的功课之一。如果没有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和发掘,就没有中国经济学的特征和国际地位。当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必须与国际接轨,而不是自说自话。当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不断创新的各种定量分析方法。这些正是历史计量学分析经济史时所使用的方法。广大学者可以借助历史计量学这个学科,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的这种历史特色阐释清楚时,中国经济史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发展经验,就可能修正和发展当下以西方经验为主导的经济学理论,也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难题提供解决之道。当然,这时我们向世界传递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还可能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资讯。所以,现在大力发展历史计量学,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召唤,为伟大的民族复兴,为中国经济学登上国际舞台,为彰显大国的辉煌历史贡献力量。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历史计量学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反过来也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那么历史计量学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从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方法上有寻求自我完善的趋势。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在当下的英美国家比较流行,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14]。这个流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但也存在不足,如重视宏观论述而缺少微观分析。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科学地重构、修正和补充,而所谓分析的方法,就包括逻辑的方法、语言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等。

从具体理论内容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特别注重发展其微观理论基础。由于受当时经济学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缺乏相应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如果运用这种理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细致的、微观化的案例研究,就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另外,在具体案例研究中或大样本分析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也需要计量、博弈论等现代定量分析工具的支持。而这些正是历史计量学的特长。历史计量学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制度变迁理论,它们各具所长,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良好素材。以诺思为代表的历史计量学派擅长案例研究,恰好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具体案例分析中的部分不足。运用计量和博弈论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也是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还是后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都可以结合历史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现实和历史中得到数据和案例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历史计量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互动发展。如果说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的话,那么历史计量学当然就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了。可以想象,在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时,重视和发展历史计量学,可能会验证或修正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贡献力量。

四、结语

一个学科的发展成功与否,自身的学科特点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够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机遇。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和发展超过三十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明成果。在我们逐渐找回民族自信、复兴民族文化的时刻,理性、正确、客观地审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更多的学人关注、参与历史计量学的研究,为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追根溯源,也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孙圣民. 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与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4): 142-161.
- [2] 韩毅. 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3): 137-145.
- [3] 王玉茹. 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4] 刘建生.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5] 陈争平. 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6] 刘巍. 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 (1): 80-89.
- [7] 赵德馨. 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1): 120-123.
- [8] 赵凌云. “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J]. 南开经济研究, 2000, (6): 21-26.
- [9] 苏少之, 张晓玲. 新中国土改后农村阶级变化再探讨[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1, (1): 29-37.
- [10] 孙圣民.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08, (10): 90-94.
- [11] 孙圣民, 徐晓曼. 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J]. 文史哲, 2008, (5): 151-158.
- [12] 孙圣民. 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计量学再考察[J]. 经济研究, 2009, (8): 135-147.
- [13] 韩毅.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方法: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1): 77-84.
- [14] 段忠桥.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47-56.

(责任编辑:胡浩志)